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以环境侵权诉讼为例

程苏起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要 | 证明标准的制定既要保护公平正义又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实现经济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平衡。2019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增加了对回避等程序事项采用“可能性较大”的证明标准规定，这表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逐步走向层次化。针对不同案件，采用相应程度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国家的大致推定、表见证明，英美法系国家“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明”等标准，这些层次化的证明标准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提供思路。以环境侵权诉讼为例，对于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平衡原被告的诉讼地位；对于不同的待证事实，采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以更好实现环境侵权诉讼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 | 层次化；环境侵权诉讼；高度盖然性；盖然性占优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述

1.1 证明标准的概念

如何理解证明标准？“用值得信赖的材料来判断人或事物的真实性”是证

作者简介：程苏起，上海政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文章引用：程苏起.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以环境侵权诉讼为例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1, 3 (6): 582-595.

<https://doi.org/10.35534/pss.0305048>

明。^①“衡量事物的依据”即为标准。^②从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证明标准即为用材料来衡量事实真实性所要达到的程度，是我们衡量证明力大小和证明结果真实性强弱所遵循的准则。本文论述的证明标准主要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

1.2 以德国为例的大陆法系国家

在罗马帝国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法定证据主义成为欧洲社会国家采用的事实认定方法，即法律规定了证据的形式、方法与证明力，只要与事实相关的证据具备了一定形式，也就拥有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而可以证明待证事实。采用证据法定主义是为了防止法官进行过度的自由裁量，但是法定证据主义对事实认定的不全面与真实性较低的弊端也暴露其不能够长时间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必然性。在法定证据主义的弊端渐显之后，自由心证主义取而代之。自由心证主义不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一定要受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法定的限制，法官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和材料，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和对证据的调查，形成自己的内心判断，也即“内心确信”，这一证据主义影响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证明标准。

德国帝国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在1885年1月14日的一份民事判决^③中提到“具有一定的盖然性，无法形成完全的内心确信”。从这一判决中我们可以得知，德国法院认为法官在事实认定中形成的心证要以“内心确信”为标准，但是囿于当时社会条件对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手段的限制，无法到达完全的“内心确信”程度。因此引入“高度盖然性”这一说法，来补充无法达到完全的“内心确信”的情况。1950年11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纵火事件^④判决理由中提到“法官依照自由心证主义，对事实的认定达到主观确信”，这一说法又将德国诉讼

①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08.

②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4卷）[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1266.

③ 黄栋.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认识[D]. 中国政法大学，2008：10.

④ 黄栋.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认识[D]. 中国政法大学，2008：11.

案件的证明标准定义为法官的“主观确信”。尽管这是在刑事案件判决中的理由，但后来在民事诉讼中也被采用，例如“法官所必须确定的并非高度的盖然性，而是其根据事实判断其是否获得个人的确信。”^①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能够发现，德国法院对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经历了从“内心确信”到“高度盖然性”又到“内心确信”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将“高度盖然性”引入证明标准中，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制，而“高度盖然性”要求法官在达到一定程度的盖然性即可认定事实，自由心证主义要求法官形成“内心确信”，这两者在具体的裁判中往往无法形成一致，于是证明标准又回到“内心确信”，但此时的“内心确信”已经包含了“高度盖然性”。

由此分析可以得出，德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实质还是“内心确信”，而这一“内心确信”，由于证明过程中各种原因条件的限制，只能是法官认定事实时所达到的最低的心证程度，盖然性就是对法官认定事实时达到的心证程度的一种表述，也即通过达到“高度盖然性”以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

1.3 以英国为例的英美法系国家

英国是我们提起英美法系首先想到的国家，1947年丹宁勋爵将证明标准表述为“如果证据的状况足以使得法庭得出‘认为其存在的可能性与不可能相比更具可能性’的结论，那么，其证明责任将被卸除，但是，如果盖然性相同，则不能如此。”^②因此，这一表述作为英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后来，经过司法实践，概括为“盖然性占优势”，也即当法官确信某一事实具有证据上的优势地位，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高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庭即可认定该事实在法律上真实存在。

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进行比较，二者都提到“盖然性”，但是两大法系对盖然性的要求存在差异。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依靠当事人在法庭中的辩论与对抗来推动庭审，发现真相。在当事人的对抗中，必

① 黄栋.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认识 [D]. 中国政法大学, 2008: 11.

② 吴杰.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基础理论研究 [J]. 法律科学, 2003 (4): 94.

然会有一方当事人在证据证明力上存在优势,当这一情况出现时,证明力占优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事实就会得到法官的支持。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盛行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是法庭上的主导力量,庭审的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推进,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为判断依据,法官因此形成“内心确信”,当法官的心证可以在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支持下形成时,这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提供的事实即可得到法官的支持。从诉讼模式的不同出发,也可看出法官在进行事实认定时依据的证明标准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中要达到的“盖然性”相对低一些,而大陆法系国家为了限制法官肆意自由裁量,对法官形成心证所要达到的“盖然性”的标准也就相对高一些。

1.4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对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探究,存在多种讨论,学者们也都有不同的依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客观真实说。受前苏联影响,学者认为我国司法机关能够做到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只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依据法律,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能够查明事实真相,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认定。学者提出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是一样的,也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通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我国《刑诉法》第162条和第200条^①,《民诉法》第64条第3款有相关规定。^②从上述条文可以推知,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种观点是法律真实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客观真实是一种理想状态,毕竟人所能达到的认识能力和使用的手段有限,在时间和空间上受限,完全的客观真实很难实现。因此,达到客观真实,其操作性并不强,也由此提倡将“法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162条第1款:“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第200条第1款:“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64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若某一事实符合法定程序和实体法规定的证据认定，从法律的角度即可认定该事实真实存在。并且，采用“法律真实”也是对诉讼效率和公平正义这两个诉讼价值之间的平衡统一。

但无论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都有各自的弊端和优势，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实现客观真实，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

目前来看，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108条^①以及2020年施行的《证据若干规定》第85条和第86条中有所规定^②，条文规定了可能性较大、高度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尽管，我国对于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已经有法律规定，但是这一规定是概括性的，司法实践和改革中如何适用，必须要结合我国现状对其进行灵活运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活动。

2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2.1 证明标准层次化的必要性

2.1.1 保障公平正义

实现公平正义是我们进行司法活动时的题中之义，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裁判，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至关重要，而如何才能够算是证明了事实的真实性就是证明标准所要实现的目标。证明标准作为衡量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是否已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85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86条：“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经达到能够使裁判者作出认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程度的标尺,对于司法活动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经济社会的发展给现代诉讼带来的挑战不断增加,如何在面临层出不穷的新型纠纷案件时还能保持公平正义,这给证明标准问题带去思考。在这些新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对案件事实证明难度的不同等等,这些原因要求我们不能够再以一个证明标准来审理所有案件,必须要进一步完善证明标准,在当前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更加层次化、多元化。不同性质的案件,面对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适用同一个证明标准已不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证明标准的层次化为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结合,是对诉讼活动中认识尺度的细致划分,直接反映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与诉讼结果的公平正义密切相关。

2.1.2 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资源毕竟有限,我们不能够在一个案件倾斜大量的、显然不合适的司法资源,这对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改革与进步没有益处。对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用尽可能少的诉讼成本处理尽可能多的案件,尽可能减少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即是对提高司法效率这一要求的方法之一,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证明的主体不同、证明的对象不同、证明的难易不同,划分不同的证明标准,有利于法官的快速裁决,在诉讼活动规定的时间内完结案件的审理,让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最大化的公平正义。

2.1.3 经济成本与经济效益的考量

理性人是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在做出一种行为之前,就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动标准。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国家作为一种特别的理性人,在制定诉讼证明标准时,也必然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期望通过最少地投入诉讼资源实现顺利裁决案件的最大化。而从多数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证明标准制定得越高,能够查明的案件事实就越清楚,也就越不会出现错案,法律的公平正义也就越能够实现。从实现正义这个角度来分析,制定的证明标准越高越好。但是不可能会有无代价的正义,越追求公平正义,越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证据质量相同时,收集的

证据越多,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就越高,对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证明力也就越强,也可以说证明标准的高低与证据数量和质量紧密相关。这同时,证明的成本也越高,因为收集证据必然花费一定的成本,不仅是时间,还有其他成本。因此,出于对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的考量,证明标准的层次化是有效平衡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益的手段之一。

2.2 大陆法系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2.2.1 德国的“表见证明”

德国民事诉讼采用通过“高度盖然性”使得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但是司法实践并非能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让每个案件都能够按照较高的证明标准得到审理裁判,以实现公平正义。而实践中,法官进行裁判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非能够轻易实现,对于那些事实不清、裁判困难的案件,法官仅仅依靠证明责任中的结果责任进行审理,显然对当事人也不是十分公平,同时也对实现程序正义造成阻碍。因此,为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德国采用了表见证明制度,即一般情况下,采用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形成“内心确信”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在例如交通事故、医疗纠纷、产品责任、环境污染等其他特殊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为了减轻原告举证压力,降低举证难度,从而更好实现立法目的和公平正义,适用相对较低的“表见证明”的证明标准。^①“表见证明”是从事件客观的情况出发,对待证事实进行推定,当事人只需采取反证能推翻对方的条件证明。^②可以认为,德国在某些领域适用的表见证明制度是对证明标准的减轻,也即证明标准层次化的体现。

2.2.2 日本的“大致推定”

同样地,日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较高的证明标准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因此,日本民事诉讼采取大致推定制度以减轻证明标准。“大致推定”从日本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过失”责任理论发展而来,主要规则为到达“高度盖然性”而形成“内心确信”,从案件客观的情况出发直接对案件中过失、因

① 李浩. 民事证据责任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231.

② 林竹.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D]. 广东财经大学, 2015: 30.

果关系等要件事实进行推认证明。同时,“大致推定”对法官也有对待证事实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的要求,这与一般的事实推定区别不大,不同的是“大致推定”借助“高度盖然性”这一经验,将“因果关系”或者“过失”等要件事实进行抽象地认定和概括,也就是说将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从具体的主张证明困难中解放出来,经过向对方当事人解释后,只需根据间接反证即可推翻“大致推定”,而无需对相反的事实再进行证明。^①这一制度也是对证明标准的减轻适用,体现了日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2.3 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2.3.1 英国的“盖然性占优势”的例外

英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通常被称为“盖然性占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统一适用这一证明标准,一些特殊性质的案件,法院也会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酌情对证明标准进行提高或者降低。1958年,英国约克郡审理的一个家庭虐待案件^②,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提到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一裁判理由提出了“盖然性占优”的例外。对类似有着“刑事诉讼”性质的案件,英国法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与案件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也即英国法院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确定会考虑案件的重大程度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2.3.2 美国的“优势证据”的例外

英美法系另一个典型国家——美国,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被称为“优势证据”,当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具说服力,该证据将更能使法官确认事实的存在,而提供了这一证据的一方将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但在涉及到遗嘱、精神病鉴定、父母监护权的行使等特殊性质的案件领域,美国则适用介于民事和刑事之间的证明标准,即“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这是因为此类案件比一般的民事诉讼更为严重,审理结果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有重大意义,甚至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必须谨慎裁判。因此,专门设置“清晰和

① 林竹.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D]. 广东财经大学, 2015: 32.

② 王天呈.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化研究 [D]. 辽宁大学, 2013: 10.

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作为美国“优势证据”的例外，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特殊领域发生的案件。

3 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3.1 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层次化必要性

3.1.1 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

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造成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这些污染事件给社会带来的不仅是财产的损失，对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带来许多问题。为了使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方在诉讼中能够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典》第1129条和第1230条从法律的层面确立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无过错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一方的举证难度，有利于弥补原告在环境污染方面的相关知识不足、对污染排放技术方面的不了解、收集证据困难等缺陷，使得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原告能够有信心并且愿意为了保护环境去提起环境侵权诉讼。但是当事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对环境侵权事实的证明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认定该侵权事实的存在，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该如何解决是我国立法上必须思考的问题。

3.1.2 证明标准层次化的必要性

许多因素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制定，例如诉讼主体的差异。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被告一般是企事业单位，原告则主要以环保组织为主，有时也会是政府部门或检察机关。当原告为检察机关时，其进行诉讼活动能力较强，与被告相比差距不大，甚至利用自己的职能优势能够使自己处于收集证据的优势地位。但是当原告为环保组织时，其与被告相比，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收集证据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往往不如被告。那么，为了平衡原、被告的诉讼地位，更好地实现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第1229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诉讼的立法目标和公平正义,就有必要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原告或被告的证明标准进行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高。

除此之外,环境侵权诉讼的待证事实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也较为复杂,一些砍伐树木、排放废水废气的环境污染行为或许相对容易证明。但是对环境侵权事件中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却相对困难,而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又需要很高的专业性,损害结果可能不是当即就发生的,可能会延迟很长时间,又或者现有的技术无法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对原告来说,提供证据具有困难,达到一般民事诉讼案件中“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更是难上加难。如此,对于维护原告诉讼利益、保护环境公益必然不利,因此采取层次化、多元化证明标准,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是十分必要的。

3.2 我国环境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3.2.1 “盖然性占优”的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主要是“高度可能性”,法院通过审查,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认定该事实存在。然而,对于环境侵权诉讼来说,笔者认为,我国更应该采取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盖然性占优”的证明标准作为原则。这里的“盖然性占优”,笔者认为只要对待证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即可认定待证事实真实存在,当然,证明的百分比越高,证明力越强。采用这一证明标准,笔者认为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现状,有利于增强当事人诉讼地位,更多依靠当事人推动庭审的顺利进行。同时,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也能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对于环境侵权诉讼证明难度也是一定程度的降低,能够更好反映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立法目的,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

3.2.2 根据证明对象区别适用证明标准

作为特殊侵权类型,环境侵权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环境侵权案件中,需要证明的要件有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客观上的损害后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在此,笔者不再讨论对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的证明应达到怎样的证明标准。

对于损害结果的证明,笔者认为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这是因为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之所以会将环境侵权事件推上法庭,必然是受到了一定的损害结果,而这一损害事实只有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最清楚,其是否受到损害,受到多大程度的损害,原告了解得更为清楚,也更容易收集证据来对这一事实进行证明。这样的证明标准也有利于防止原告滥诉权,对被告造成损害。

对是否发生侵权行为的证明,笔者认为“盖然性占优”这一标准更为合适。被告是否实施侵权行为是判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原告应当对此进行证明。但是原告与被告相比,经济能力和诉讼能力明显处于劣势(此处的原告主要指环保组织),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差距使得原告对被告某些侵权行为的证明出现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原告需要做到的是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这样的标准有助于原告顺利进行诉讼活动,维护合法权益。

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我国法律规定有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一规则使得证明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归于被告行为人。那么在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上,被告必然要承担更多说明的义务,并且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是环境侵权诉讼的特点之一,并非一般人所能说清,而且,因果关系认定也决定着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因此,对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明标准应当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3.2.3 根据证明主体区别适用证明标准

环境侵权的证明主体和普通民事诉讼一样,证明主体主要是双方当事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采用举证倒置规则,被告承担侵权行为是否导致损害结果的证明责任。从证明技术和立法目的来看,应当对被告采取“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以保护受到损害的环境和受害者。

而对于原告来说,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降低证明标准,是我们的目标。对环保组织来说,即使长时间从事保护环境的工作,但是对于证据的收集也存在困难,缺少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使得其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为了保证原告的合法权益能够实现,同时,也鼓励更多组织加入保护环

境的活动中去,对环保组织,要求其达到的证明标准为“盖然性占优”更符合立法初衷,只要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其不可能性,便能够认定事实是真实存在。对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来说,其比环保组织有优势,技术水平和资金支持更强,故可以采用位于“盖然性占优”和“高度可能性”之间的证明标准,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的职能优势,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

4 结语

环境侵权诉讼案件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为了更好地解决此类案件,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存,我们应当对其重视起来。对于案件的审理要适用的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据何种证明对象、由哪个证明主体进行证明而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以平衡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地位,既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又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减少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通过对环境侵权诉讼案件证明标准的层次化,也是对我国当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检验与发展,为进一步规范、合理地分类分层证明标准提供可行思路,进而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体系的发展格局,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 [1] 雷万来. 民事证据法论[M]. 台湾: 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7.
- [2] 江伟. 证据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 [3] 李浩. 民事证据责任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231.
- [4] 何家弘. 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J]. 法学研究, 2004(6).
- [5] 吴泽勇. “正义标尺”还是“乌托邦”? ——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 法学家, 2014(3).
- [6] 吴泽勇. 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 清华法学, 2013(1).

- [7] 吴杰.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基础理论研究 [J] . 法律科学, 2003 (4) : 94.
- [8] 吴杰.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理论基础研究 [J] . 现代法学, 2003 (5) .
- [9] 张卿. 证明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J] . 比较法研究, 2013 (4) .
- [10] 吕忠梅.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J] .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3 (5) .
- [11] 黄栋.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认识 [D] . 中国政法大学, 2008: 10-11.
- [12] 任凌慧. 环境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层研究 [D] . 重庆大学, 2018.
- [13] 王天呈.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化研究 [D] . 辽宁大学, 2013: 10.
- [14] 王永祥.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D] . 西南政法大学, 2017.
- [15] 林竹.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D] . 广东财经大学, 2015: 30-32.

The Hierarchy of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in China's Civil Procedure —Taking Environmental Tort Action as an Example

Cheng Suq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should not only protect fairness and justice,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save

litigation resources, and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cost and economic benefit. In the provisions on Evidence in Civil Procedure amended in 2019,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for procedural matters such as withdrawal is more likely to be adop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in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is gradually becoming hierarchical.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ses, standards of proving of corresponding degree are adopted, such as roughly presumption and apparent proof in civil law countries, and “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etc. These hierarchical standards of proving provide ideas for the hierarchical standards of proving of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tort lawsuit as an example, different levels of standards of proving should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subjects of proving to balance the litigation status of the original defendant. For different facts to be proved,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roving are adopted to better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Key words: Hierarchical;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High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revails